

作者: Iwan Susanto

译者: 亮剑

苏加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外交

佐科维总统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接触,试图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帮助建立和平,佐科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,随后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。

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,参与争取世界秩序与和平的斗争始终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进行。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10周年时,于1955年成功地召开了亚非会议,鼓励亚非国家独立。苏哈多总统随后还设法通过1991年的巴黎和平协议促成柬埔寨作战的一些派别和解。

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的历史学家韦迪彦多(FX Widiyanto)于2022年7月19日在外交部表示,通过亚非会议,许多国家在1960年代从西方国家的殖民化中独立出来。此外,苏加诺还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,成功地获得了对西伊里安(即西巴布亚)返回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的支持。

韦迪彦多指出,苏加诺成功地邀请了来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斯里兰卡和缅甸的四位总理。虽然,西伊里安问题在《万隆会议十项基本原则》中没有被提及,但在西伊里安和其他国家的非殖民化议程中仍然被提及。

当时在万隆亚非会议涉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·萨斯特罗·阿米佐约和1953-1955年任职的外交部长的苏纳内奥的许多角色。

迦达玛达大学的历史学家韦尔丹(Wildan Sena Utama)在《1955年亚非会议,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知识起源及其遗产》的书中指出,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,一是持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,一是持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,使第三世界国家在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中,作为替代方案发挥重要作用。第三世界国家挑战西方统治,争取主权,促进世界和平。

随着冷战蔓延到南半球的亚洲和非洲,第三世界谈论并

寻求超越美国和苏联思想的“第三条道路”。

阿尔伯特·索维(Albert Sauvy)是1952年的法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,其在社会主义期刊《L'Observateur》上引入了“Tiers Monde”或“第三世界”一词,作为亚非国家的平台,这些国家不赞成由西方资本家主导的第一世界,美国-西欧-战后日本或第二世界,即由苏联驱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团。东欧,包括拒绝资本主义的中国。

随着冷战蔓延到南半球的亚洲和非洲,第三世界谈论并寻求超越美国和苏联思想的“第三条道路”。

德国-意大利-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后,有两个主要的意识形态阵营,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分裂了世界。原本,1947年3月12日,哈里·S·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面前发表讲话,宣称世界目前一分为二,即民主阵营和自由阵营(其中自由与资本主义世界,即一群超级富豪精英)与另一阵营,即权力以恐怖和克制(苏联)为主。该演讲被称为“杜鲁门主义”。

一年之前,1946年2月9日,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讲话中说,“世界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发展”是所有危机和灾难的根源,苏联人需要一个防御计划,在与西方国家爆发战争之前。

当时的殖民政权由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西方国家主导。相反,共产主义国家强烈支持被殖民国家的独立,因为,殖民化被认为是资本家对殖民地人民或被压迫者的一部分。根据共产主义的思想,统治阶级的斗争和反对与工人阶级或普通人民一起被强烈地资本化。

印度尼西亚民族在1947年的斗争,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推动下进入了联合国的议程也就不奇怪,即当时的乌克兰仍然是苏联的一部分。印度尼西亚事务问题也列入联合国安理会议程,不再被视为荷兰在殖民地的国内问题。

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动力非常高,包括在新独立国家和争取独立的国家中寻求影响力。

韦迪彦多表示,当时印度尼西亚尚未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;因为遭到国内有一股政治力量的反对。他们担心共产主义组织寻求控制权力的企图;并且还受到1948年东爪哇茉莉芬(Madiun)事件的影响。

韦迪彦多指出,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议会不同意我国计划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,并在雅加达设立苏联大使馆。当时,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,有苏里普诺(Suripno)领导的Indof或印度尼西亚办事处,与莫斯科进行沟通。

韦尔丹指出,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表示,在亚洲存在一个中间地带,这个中间地带广泛地延伸到作为帝国主义大国的美国和苏联之间。中国共产党决心与苏联站在一起反对美国。

随后,在1948年,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缅甸和菲律宾等中间地带的许多共产党组织将国民阵线的战略(与政治阵营和非共产党部队合作)转向武装斗争。

韦尔丹写道,此举据称是1947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的东南亚青年会议的后续行动。代表大会与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举行。

1945-1949年,中国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,共产党赢得了胜利。国民党阵营逃往台湾,其余的分散在越南、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附近,直到1980年代,国民党残余部队在当地组织武装部队和生产海洛因。这些国民党残余部队在冷战和印度支那冲突中,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要资产。

1949年在中国的内战结束后,美国支持的南朝鲜和苏联支持的北朝鲜的爆发战争。为了应对日益分裂的世界,新独立的国家不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拖入新的冲突中。

因此,亚非会议也就应声组织起来了,并在印度尼西亚

的万隆举行,出席的国家有29个。苏加诺与印度总理尼赫鲁、埃及总统纳赛尔、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成为主要人物,与其他政治家一起,还有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·阿里·吉纳、缅甸总理乌努和斯里兰卡总理约翰·科特拉瓦拉爵士。

从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,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的会议开始,该会议是3月9日至22日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的“五国会议”的后续行动。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已经日趋成熟。谴责殖民化和非殖民化、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和核武器威胁造成的世界紧张局势、支持民主、反对两大阵营干涉别国事务、世界和平等议题都提出了讨论的议程。

“自由之路”是从旅馆步行到举行亚非会议的独立大厦(Gedung Merdeka),成为鼓励亚洲和非洲国家独立的象征,在实施万隆亚非会议和“万隆十项基本原则”宣言后,独立运动就变得越来越普遍。苏加诺、纳赛尔、尼赫鲁、周恩来和亚非会议领导人受到成千上万的群众的热烈欢迎,欢迎群众挤满了亚非路。

“万隆十项基本原则”的内容是按照《联合国宪章》即尊重人权、尊重各国主权和完整、承认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、不干预或干涉别国内政、尊重各国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自卫或集体保卫的权利。

其次,不利用集体防御规则为任何主要国家的利益行事,不以侵略或武力威胁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目标,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,推进共同利益,尊重国际法和义务。

万隆亚非会议参与国的总人口达到14亿人,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的一半。

苏加诺总统还擅长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进行外交。在争取西伊里安回归印

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同时,苏加诺设法获得了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的武器支持。美国于1958年通过中央情报局支持西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的PRRI-Permesta叛乱分子起义,改变了路线,转而支持苏加诺。

有一次,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国防武官苏尔约苏达尔梭上校(1960-1963)的儿子苏拉索·巴萨拉讲述,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军事使命的访问受到美国的热烈欢迎。

美国肯尼迪总统被称为苏加诺最好的朋友。然而,美国情报部门并不与肯尼迪总统一路,仍然对苏加诺持怀疑态度。

除了苏加诺之外,在为古斯塔·努鲁尔大家庭出版的回忆录《古斯塔·努鲁尔回忆录》中,还有雅尼将军和纳苏蒂将军访问美国的照片。苏加诺于1961年访问美国,并受到肯尼迪总统的亲自接见。

美国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C-130大力神运输机与LST 511运输船的援助。在《1945-1965年海军国防装备发展史》一书中指出,美国军事援助计划在1960年3月和12月以及1961年6月派出了几艘LST 511运输船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休船只是KRI Teluk Langsa, KRI Tanjung Nusarive, KRI Teluk Bayurt, KRI Teluk Kau, KRI Teluk Manado 与 KRI Tanjung Raja。

然而,苏联却全心全意提供新战舰、战斗机、战略轰炸机,以及威士忌级潜艇和科马尔级导弹舰艇。当时,印度尼西亚拥有来自斯维尔德洛夫级的印度尼西亚巡洋舰伊里安,长200多米,当时,在该地区起着威慑作用。

更不用说从米格15到米格21的米格战斗机机队,米型直升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直升机之一,即Mil Mi-6,到US-1犬舍反航母导弹。实际上,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1960年代初成为南半球的主要军事力量。

在苏加诺访问美国前一年,即1960年2月底至3月初,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尼西亚。这次访问为苏加诺在1956年访问苏联的回访行动。苏加诺的访问

以圣彼得堡市蓝色清真寺的落成典礼为标志。这座清真寺建筑最初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被关闭并用作仓库,被苏加诺要求归还作为礼拜场所。

在访问俄罗斯之前,苏加诺要求赫鲁晓夫总理找到布哈大祭司的坟墓,作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人物之一,特别是作为圣训学者。

前往布哈里坟墓大祭司的朝圣活动,被用作苏加诺访问的条件。苏联认真地寻找布哈里大祭司的坟墓。被发现后,苏联政府对坟墓进行了翻新,直到现在还保持得非常完好。

说得一口流利泰语的俄罗斯驻印尼大使柳德米拉·沃罗比耶娃(Lyudmila Vorobieva)曾一度表示,蓝色清真寺、苏加诺和布哈里大祭司坟墓,是印尼-俄罗斯友谊的节点。《椰子岛的诱惑》的民歌在俄罗斯也很受欢迎。

苏加诺于1956年访问苏联,达成了和平共处协议。这与韦尔丹在其《亚非会议,其知识渊源和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遗产》一书描述的苏联不断变化的态度是一致的,该书描述了苏联通过模仿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模式,通过促进经济发展,将苏联的方法从军事行动转变为经济方法。

苏联和美国也向苏加诺赠送了一架总统专机。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都试图抓住成为第三世界人物的人,或者选择不参与超级大国两个巨人之间的争斗的不结盟国家。

一些被命名为Sapta Marga, Irian 与 Pancasila 的 Ilyushin 14 Dolok Martimbang 的苏联飞机,以及 Lockheed C-140 Jetstar 的美国飞机,现在存放在日惹的空军“Dirgantara Mandala”博物馆。

1955年,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只有十周年时,直到1960年代解放西伊里安时,代表世界人口的一半,成功举行了亚非会议;这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的里程碑之一。随后的印尼总统继续外交努力,包括佐科维总统访问两个交战国乌克兰和俄罗斯。

(作者系《罗盘报》资深记者。本文原载于2022年8月14日《罗盘报》官网)

廖省: 林越

台胞被诱骗 绿营乱甩锅

自去年下半年起,不断传出有台湾人受高薪诱惑被骗到柬埔寨、泰国和缅甸等国,遭到殴打、拘禁、转卖甚至性侵的新闻。台湾人为何“前仆后继”飞往柬埔寨?他们的追梦之旅如何变成噩梦?据称有5千名台湾人被诈骗集团诱到东南亚,其中2千多人仍被扣押。

《联合新闻网》8月刊文评论,诈骗犯暴增,与不断有岛内青少年愿意加入有很大关系。一些年轻人想赚快钱,加上法院对年轻人的轻判,使犯罪成本大幅下降,让诈骗集团从不缺乏新血。台湾“警政署”统计,2014年青少年主要犯罪是毒品与盗窃,自2018年始,诈骗已成为岛内青少年首要犯罪,2021年的诈骗犯更远超盗窃和毒品嫌犯的总和。

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分析,台湾诈骗已经“饱和”,于

是开始出口。台湾人在诈骗地点“很受欢迎”,一来会讲中文,而诈骗对象有大陆人;二来免签地方多,来去自由;第三是有技术。台湾诈骗犯有20万人,但诈骗罪很轻,仅约500人被判一两年刑期。

《亚洲周刊》第35期童清峰撰文《东南亚诈骗案绿营泛政治化》台湾民间自力救济网是先锋报道:“由于绿营政府将事件泛政治化,指责是北京‘一带一路’的遗毒”,台湾民间只有自力救济。”“网红‘好棒Bump’成为救援先锋,但面对对局的刁难。”

“好棒Bump”因营救海外受骗者而爆红,很多被救者点名感谢,有人称他比政府还有用,暗指当局尸位素餐;绿营网军随即对这年轻网红发动围剿,因他“抢走”原本政府该做但没做或做不到的事,令绿营感到难堪。民进党网路社

群中心的薛舜文转移话题、卑鄙地批评Bump:“外表丑、内在又垃圾的恶男,凭什么骂外交部?”反而引起网民怒怼!

《中时新闻网》18日称,台湾网红Bump的网红年初曾救援被骗到迪拜做苦工的台湾民众,不满台当局驻迪拜办事处消极应对,开撕台外事部门。却被警告勿以讹传讹、误导民众。Bump当晚在视频网站YouTube直播,邀请当初受困迪拜的林誉洲出面作证。他表示,台外事部门若积极救援,怎会轮到到他一个普通老百姓,难道吴钊燮会比他差吗?还点名吴钊燮出来交代清楚,要怎么救人?台湾《中国时报》19日刊文批评称,“明明是蔡当局自己没能力救人,又看不得别人救援成功,还加以抹黑,这种心态实在可恶可恨。”

台外事部门赶紧改口感

谢Bump救援,发言人欧江安鄙地批评Bump:“外表丑、内在又垃圾的恶男,凭什么骂外交部?”反而引起网民怒怼!

面对数千民众遇险,民进党当局束手无策,只派警察到机场举牌警告。有受骗者返台后称,他们在台家属不断向当局求救,但得不到正面回应,听得最多的是:“台湾跟柬埔寨没有正式邦交,所以没有办法救人”。有受害者称向台外事部门求助,结果遭挂电话。民进党对台湾民众维护权益的呼声态度消极,甚至编造谎言、甩锅大陆,充分暴露他们不把民众的生命安全、利益福祉放在心上。当局18日公布,主动访查及立案373起,已通过公私合作救援39人,台湾媒体给出的数据是:至少4000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。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日对媒体表示,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领事保护工作,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正与驻在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,积极查找并解救相关人员。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答记者说:“台湾同胞是中国公民,维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”

台湾前“立委”林丽蝉直言,不要将柬埔寨污名化,“其实是台湾人坑台湾人”。一名被救者说,他的工作是负责网恋诈骗,公司发给他10部手机,都是不同号码,要他们假扮成女性征婚或在交友网站上找“猎物”骗钱。而这些“猎物”,往往都是台湾人。

国民党批评称,岛内贫富差距严重,青年失业率高、长期低薪是诈骗问题恶化的推手。年轻人想找高薪工作,只能往海外发展。“把人民推入火坑的,不就是民进党政府吗?”

《中国时报》17日称,蔡英文2016年上任后力推“新南向政策”,4年内编列250亿元新台币预算,每年都夸口“成效良好”。《联合报》18日社论,蔡当局6年来力推“新南向”,却从未提醒民众可能的风险;而台湾横行多年的诈骗集团始终未能根除。台湾当代青年为什么会有就业问题,是因当局施政不力造成的经济不景气,衍生了各类社会问题,这是环环相扣的。所以,他们明知网赌电诈的风险,却还要去东南亚冒险、碰运气。

本名黄煦杰的“Bump”身世坎坷,让他养成扶助弱势的义气,去年开始投入反诈骗活动,拍摄一系列“诈骗解码”揭发黑心团伙的影片,短时间内就成了岛内反诈骗的风云人物。感恩有Bump黄煦杰、大佬张安乐、国民党立委、慈济及中国驻大使馆等不畏艰险,在绿营乱甩的“黑锅”中,救出了不少身陷险境的“中国人”,历史会写下公正的评价!



王裕谿

遗产建筑是建筑界的重要组成部分,因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已取代了许多旧建筑。致力于旧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建筑师也不多。其中一位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建筑师是威迪亚·维嘉廷迪(Widya Wijayanti, 华文名 Ong Djioe Kwan 王裕谿)。

1953年,王裕谿出生于中爪哇淡满光县(Temanggung)的帕拉坎(Parakan)。她在蒂博尼哥罗大学完成本科课程,在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获公共卫生科学硕士(Master of Public Health Sciences)、城市和区域规划硕士(Master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)。她是印尼文物机构(The Indonesian Heritage Trust, 或 Badan Pelestarian Pusaka Indonesia)的创办人之一,后来因不认同政府政策,她辞职了。她担任中爪哇印尼建筑师协会主席。她是把斯马维斯咖啡厅(Semawis Coffee)(用于旅游业的三宝垄唐人街)建成斯马维斯市场(Semawis Market)的发起者,在这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作用,斯马维斯咖

建筑师(6)

阿比丁·库斯诺(ABIDIN KUSNO)

啡厅现在是三宝垄旅游业的主要支柱之一。王裕谿是多个项目的公共工程顾问,包括城市遗产(至今仍担任)、爪哇岛南部路线和边界地区发展的发展问题。

印尼建筑的历史机构 通过谢永源、郭振祥和林布迪的工作,我们可以看到印尼建筑师通过各种策略回应印尼的文化政策。另一个是成立了印尼建筑史研究机构(Lembaga Sejarah Arsitektur Indonesia, LSAI),其目的是“培养对印尼建筑史的认识”,并在印尼土壤中保存建筑文化宝

藏”。这个机构是由尤思瓦迪·萨利亚(Yuswadi Saliya)、山迪·斯勒卡(Sandi Siregar)、哈尔约托·昆托(Haryoto Koento)和陈贵良(Sutrisno Murtiyoso)倡议,于1989年成立。他们邀请了40位建筑师前来讨论成立印尼建筑史研究所的目标。约30人在这次会议中签署了联合声明。当中有10位是华人建筑师,包括谢永源(Gunawan)、林布迪、杨汉义(Jo Santos)和陈国林(Johannes Widodo)。我们已经了解谢永源和林布迪在建筑界的贡献了。在这里,我们提到了出席

会议并在各自领域和机构中为印尼建筑业做出贡献的华裔建筑师。



陈贵良

苏特里斯诺·慕尔迪约梭[Sutrisno Murtiyoso, 华文名 Tan Koei Liang 陈贵良, 1955年出生在中爪哇帕拉坎(Parakan)]是印尼建筑史研究机构的发起者之一。他

1985年毕业于万隆巴拉扬安大学(Universitas Parahyangan Bandung),毕业后,他在万隆任教、写作、做研究。陈贵良是最爱阅读的华人建筑师之一,因此他经常与建筑文档、图书馆有紧密联系。他长期担任印尼建筑史研究所主席,与建筑文档等关系密切,也不足为奇了。

2007年,陈贵良为初中9年级学生写了一本关于住宅区的教科书。除了忙于做研究和写书(撰写关于祠堂的书),他也担任武侠小说社团的副主席,这个社团最近出版了《建筑与武侠小说》(Arsitektur dan Cerita Silat)一书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三册)》。本篇未完待续)